



当前教育革命指針

人民教育出版社

当前教育革命指針

人民教育出版社編

1960年·北京

当前教育革命指針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2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北京景山东街）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人民教育印刷厂印装

统一书号：7012·495 字数：93千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4 插页：1
1960年7月第一版
1960年9月第1次印刷
北京：1—50,000 册

定价 0.44 元

編 者 的 話

这本书是《我国教育工作方針》一书的續編。

这本书里包括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教育方針的指示和决定，领导同志有关教育方針的言論和《人民日报》有关教育方針的社論。这些文件发表的时间从1959年5月到1960年6月。

这些文件进一步阐发了党的教育方針，推动着教育革命不断地前进，对全国教育工作者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我們編輯这本书就是为了帮助教育工作者进一步貫彻执行党的教育工作方針，促进教育革命的深入和发展。

1960年6月

目 录

中共中央关于推广注音識字的指示	1
(1960年4月22日)	
附：山西省委关于在全省推广万荣县注音識字經驗 爭取提前使山西成为无盲省向中央的报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农村中繼續扫除文盲和巩固发 展业余教育的通知	9
(1959年5月24日)	
国务院关于全日制学校的教学、劳动和生活安排的規定	12
(1959年5月24日)	
* * *	
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教育和文化、 卫生、体育、新聞方面社会主义建設先进单位和先进 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祝詞	17
(1960年6月1日)	
陆定一：反右傾，鼓干勁，配合增产节约运动，大搞文 化革命	22
(1959年10月30日)	
陆定一：教学必须改革	34
(1960年4月9日)	
林 桢：大搞文化革命，实现工农群众知識分子劳动化	46
(1960年6月1日)	

• • •

楊秀峯：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	70
(1960年4月8日)	
楊秀峯：做教学改革的促进派……………	80
(1960年6月10日)	
林 楓：大办职工业余教育，迅速培养技术力量……………	83
(1960年1月13日)	
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	105
(1959年9月19日《人民日报》社論)	
迎接新的更大的文化革命高潮……………	110
(1960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論)	
全民大办业余教育……………	116
(1960年3月23日《人民日报》社論)	
大力推广注音識字爭取提前扫除文盲……………	121
(1960年5月11日《人民日报》社論)	

中共中央关于推广注音識字的指示

1960年4月22日

山西省万荣县注音識字的經驗(見附件)是我国文化革命中一項很重要的創造，应当在全国迅速推广。山西省万荣县在两个月內消灭青壯年文盲的經驗，解决了扫盲运动中的两个大問題，一个是消灭了扫过盲又大量回生的現象，一个是保証了認識一千多字的农民可以无师自通地大量閱讀注音卓報，在自习中不断增加識字的数量。这就大大便利和加快了业余教育的工作，并且使农村讀書成風，真正表現出了农村文化高潮到来的氣象。提前扫除青壯年文盲是提前实现农业纲要四十条的重要关键之一，因此，推广万荣县的多快好省的扫盲經驗是一項重要任务。现在山西省委已决定在全省普遍推广这一經驗，并且力争大大提前实现无盲省。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即是說，除若干少数民族地区和某些方言地区以外)也都可以而且应当普遍推广这一經驗。只要各省市區党委下定决心，抓紧时机，在今年秋前試點和訓練师资，准备教材和注音讀物，在秋后就可以大規模地推广，就有可能用跟山西相同或相近的速度扫除文盲。与此同时，应当在学生、教師和青年工人、农民、店員、職員、部队官兵中大力推广普通話，造成風氣。此外，为了加速扫盲和減輕儿童学习负担，现有的汉字还必须再简化一些，使每一字尽可能不到十笔或不超过十笔，尽可能有简单明了的規律，使难写难认难记、容易写错认错记错的字逐渐淘汰。这一任务必須

依靠广大群众，广大群众对此是十分热心和有办法的。請各省市區党委指示当地有关部门在最近期间提出一批新简化字的建議，報告中央文字改革委員會綜合整理后送中央和国务院审定。

中共中央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山西省委關於在全省推廣萬榮縣
注音識字經驗爭取提前使山西
成為無盲省向中央的報告

中央：

現將萬榮縣開展注音識字運動的情況和經驗報告如下：

萬榮縣在过去十年來，對於掃除文盲的工作是一貫重視的。從1958年以來，由於生產的大發展，人們思想的大解放，群眾學習文化的勁頭越來越高漲。到處可以聽到這樣的議論：“水利化、機械化，沒有文化不能化。”但是群眾想文化又怕文化。這就是掃盲畢業之後，回生復盲的現象非常嚴重。到1958年10月止，全縣共掃除青壯年文盲三萬四千多人，而回生復盲的便有一萬三千多人。這些人自稱他們是“畢業了的文盲”。即使已經脫盲的人，也因識字有限，閱讀和寫作都有困難，不易鞏固和擴大掃盲成果。萬榮縣委針對這種情況，在1958年10月間便研究如何使掃除文盲和業余教育工作也來個大躍進，以適應生產大躍進形勢的需要。於是決定在全縣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採用注音識字的辦法，高速度地開展掃除文盲和業余教育運動。經過幾個月的重點試驗，其效果本來是很好的。但由於當時黨內對注音掃盲這個辦法在思想認識上不够一致，因而當1959年推廣這一經驗時，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表

現了時起時落、勁頭不足的現象。到了1959年10月，县委進一步總結了注音扫盲的經驗，批判了錯誤的思想，並且在作了充分的準備之後，一鼓作氣，便在全縣範圍內掀起了全民教育民學的注音扫盲高潮，全縣二十萬人中就有十四萬人卷入學習漢語拼音的運動中來，並且取得了預想不到的成效。僅僅在兩個月的時間內，即到1959年12月底，全縣一萬三千二百四十六個青壯年文盲（包括復盲和剩余文盲），全部脫離文盲狀態，提前實現了青壯年無盲縣。二萬四千個老年文盲也自動參加了扫盲學習。其中有二百四十人已經脫盲，九千三百多人掌握了漢語拼音方案。並且有十萬七千人可以說普通話了。

農民跳過了扫盲識字的門檻，便大踏步地向文化革命進軍。業余教育運動，就像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到現在為止，全縣青壯年參加業余高小班的達到五萬二千多人，參加業余初中班的達到九千六百多人。兩項人數合計，達到青壯年總數的86.5%，占應參加人數的94%。轉眼之間，群眾性的看書、買書、借書、寫作形成了社會風氣。1959年12月一個月，全縣僅注音讀物一項，即銷售了十八萬冊，預訂了二十四萬冊，但仍不能滿足群眾的需要。在萬榮農村里，居然出現了開書荒這樣的新鮮事。王顯人民公社青谷管理區圖書室原有七百余冊書，過去出借的不到一半，現在有七千余冊書全被借光了。過去借書是一人一本，現在一借就是几本、甚至十几本。過去借書是單人借，現在是一戶一戶的借。過去人們借書，愛借連環畫、小人書，現在人們却爭先恐後地搶着借《毛澤東選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林海雪原》等六本本書了。在這裡，迅速地涌現出了許多農民詩人，農民作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隨心所至，出口成章。不到一年時間，全縣創作了一百九十多萬首詩。四十七歲的李太柏，寫出了兩萬多字的《我的生活片

斯》。十八岁的青年妇女王民英，写成两万多字的《青谷村变迁史》。三个孩子的奶奶董玉香，决心要苦练十年，争取变成大学生。真是才华横溢，花果满枝，雄才大略，壮志凌云。不仅如此，现在全县已经有一千七百五十个脱盲农民，组成三百二十二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小组。柴河人民公社刘村管理区，去年只有十二人学习理论，现在扩大到八百人。他们学过《毛泽东选集》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以后，大家的思想顿时开朗，懂得了如何对待新鲜事物，参加公共食堂的人数突然扩大到95%以上。毛泽东思想正在迅速地武装着农民的思想，从而越来越大地转变为推动整个工作前进的物质力量。

万荣县的经验证明，注音识字的办法，是多快好省地扫除文盲、巩固和扩大扫盲成果的好办法，是加速工农群众知识化的捷径。利用拼音字母扫盲，青年人一般用十五到二十小时、壮年人用二十五到三十小时的拼音教学，就可以学会汉语拼音方案；再经过大约一百二十个到一百五十个小时的阅读和写作的教学，就可以识汉字一千五百个，达到扫盲的标准。而且在掌握了汉语拼音这个工具达到扫盲标准之后，就可以不受识字数目的限制，大量阅读注音读物，练习写作，就可以无师自学，举一反三，互教互学，从而使群众性的学习运动更加容易广泛地、持久地开展起来。今年1月，该县王显公社青谷管理区把1958年下半年用注音识字办法毕业的一百零一个学员进行了一次测验，巩固住一千五百字又增识五百字左右的有四十二人，占41.6%，保持住一千五百字的五十一人，占50.5%，认得一千字左右的只有八人，占7.9%。这少数巩固较差的学员，主要是因为学习不经常、阅读通俗读物少的缘故。当时对没有用注音扫盲办法毕业的学员也作了一次测验，回生现象竟达到64%以上。在扫盲过程中，万荣县说普通话也形成了社会

风气。所以群众总结注音识字的好处是：“拼音字母是钥匙，它给汉字当老师，钥匙好比开心锁，所有文盲都扫尽。”“注音识字好办法，一打开下丙朵花，一朵搞掉文盲帽，一朵学会普通话。”

万荣县的经验还证明，推行注音识字的办法，对于改革工农业业余教育和全日制小学教育的学制，缩短教学年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去年11月他们在一些业余教育和全日制小学教育中改用了注有拼音字母的课本，在教学方法上把课本由浅入深地划成几个单元，每个单元选择重点课进行精讲，同时加强阅读和写作指导，这样就大大缩短了语文教学的时间。过去一般用三年时间才可以学完的语文课，现在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学完了。语文课的时间缩短了，就能修多政治、数学和科学技术等课程。现在该县已经在普遍推行业余高小的一年制，在五个秋季始业班和三十个春季始业班的完全小学中实验小学四年制。此外，该县在幼儿园大班中加授拼音字母和注音识字的试验，其效果也是良好的。

万荣县采用注音识字办法，进而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工作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它和其他事情一样，是经过思想斗争的。开始，有些人对拼音扫盲办法，怀疑挺多，没有信心；对大搞群众运动的方针，也提出一堆困难，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是，万荣县委坚决地排除了各种悲观论调，坚决地实行政治挂帅、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的方针。各级党委由第一书记挂帅，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层层成立专管机构，一竿到底地组成领导注音扫盲运动。县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各人民公社设文字改革委员会分会，管理区设指导小组，并且在全县范围内组织了一支二百三十多人的专职干部队伍，运用“小田试验，大田推广”，现场观摩，交流经验的办法，由点到面地全面铺开。但是，要开展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首先碰到了一个师资缺乏的问题。的确，当时万荣县只有两

一个拼音教师，师资力量实在太小了。这也是一切悲观論調的一个根据。可是，这个难题，并沒有把有雄心大志的人們吓倒。他們运用了大搞群众运动，大走群众路綫的方針，采取了滾雪球的办法。县、社分工負責，层层培訓骨干，社社成立傳授站，区区成立教研組，小学教师包教群众教师，学生包教扫盲学员，积极分子当“小先生”，专职教师和业余教师緊密結合，边教边学，边学边教，人人是先生，人人是学生。就是这样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越滚越多，越滚越大，几个月的时间，全县便培訓了两千名教师，三千五百名辅导員。从此，一个声势浩大的“民教民”的扫盲学习运动在全县范围内掀起起来了。“亲教亲，邻教邻，子女包教父母亲，爷爷不懂問孙孙”的事例到处皆是。周王村薛振平和屈伶仙是夫妇俩，他(她)們在学习中互相帮助，互相比赛，在二十天的时间內，两个人同时摘掉了文盲帽子，变成了有文化的人。南牛池村青年妇女賈惠苗，自己摘掉了文盲帽子，还教会四岁的女儿賈秋联四十多个拼音字母。在全省推行注音扫盲現場會議上，母女俩进行了拼音識字表演，博得观众个个贊口不絕。师资問題解决了，解决教材問題也是一件重要事。除了上級发給一部分注音讀物外，他們主要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自編了两万余册注音教材，并发动群众自編补充教材，还創办了每期发行九千份的《万荣拼音小报》。另外，他們在农具上、标语上、墙头詩歌、机关、学校門口挂的牌子上，都加了拼音字母，形成一个遍地是教材，“注音文字包围文盲”的識字环境。

大搞群众性的扫盲学习运动，会不会妨碍生产？說悲观泄气話的人也作了否定的答复。万荣县委采用学习和生产統一安排、統一部署、緊密結合的办法，除把扫盲学员按程度不同划分开班級，定时上课以外，又按生产中的专业队和作业組，分別編成地头学习組、炕头包教組、飼養員学习組、水利工地学习組，提倡下地生产要

带一包(流动图书包)、四宝(书、水笔、抄写本、报纸),做到书不离身,抽空就学。而且学习的方式,随着农事季节的转换,生产活动形式的改变而改变,多样灵活。就是这样,扫盲学习不仅没有妨碍了生产,而且人民群众学习文化的成果,立竿见影地推动了生产的大发展。事实证明,许多学习积极分子同时就是“红勤巧俭”运动中的模范。农民当了文化的主人,表现得更聪明、更能干了。青谷村二十五岁的青年程宽牛,在过去性格迟钝,思想落后,别人称他是“悶块”。但是当他脱掉文盲帽子以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人们都说:“悶块开窍啦”。现在的程宽牛已经識到三千多字,讀了二百多本书,还写了三万字的《自傳》。眼下他正在讀《矛盾論》和《我的一家》。他讀了《列寧梅忘本》一书以后,感到自己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心里十分惭愧,大大启发了他的政治覺悟。他学了《黑妮种棉》和一套科学技术小册子以后,自己种了一块棉花試驗田,結果創造出高于当地产量两倍的高产纪录。由于他的思想和生产双跃进,程宽牛被选为生产队长和队的紅专学校校长,并且加入了共产党。悶块开了窍的人,何止是程宽牛。脱了文盲帽子的农民,在向文化革命的进军中,同时又向技术革命进军,要为彻底改变落后的生产面貌而斗争。現在結合生产組織和生产基地,全县建立了各式各样的科学技术学习組織。参加这种学习組織的全县已有六万三千多人,其中研究棉花栽培技术的有二万六千七百人,研究土壤的有一万四千三百人,研究畜牧兽医的有二千一百多人,研究农业机械的有二千八百多人。全县七个公社設立了七个科学研究中心,共挑选出一千六百三十人,組成专业生产队(也是学习优秀班),集中劳动,集中学习,培养科学技术的骨干。現在各公社和管理区的脫盲青年,在技术革命运动中已經发挥很大的作用。如孙吉管理区土化肥厂的工人,讀了汉语注音的科学技

技术书籍之后，已经仿制成功了氮、磷、钾混合肥料及其他土化肥十多种。孙吉公社综合加工厂工人王三娃，经过十三天的苦心钻研，仿制成功一种净麦机，一天能净麦一万多斤，比人工净麦提高工效二十五倍。从许许多多的事实中完全可以看出，万荣县文化革命的高潮，已经在促进技术革命高潮的出现，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双双跃进，必将把持续的、高速度的生产大跃进推向更新的阶段。

为了推广万荣县的经验，我们于去年12月在万荣县召开了有各专、市、县的教育行政干部、共青团干部和中、小学校长教师等共六百人参加的现场会议，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全国妇联的负责同志和黑龙江、福建、四川、甘肃、内蒙古等十四个省（区）的代表八十余人也应邀参加。这次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目前这一工作的进展情况是良好的。据不完全的统计，全省已经训练出拼音教师六万七千六百多人，参加汉语拼音学习的已有三百二十八万多人，其中有二分之一的人已达到会认、会拼、会写的标准。晋南专区农民参加拼音学习的已达一百一十四万人，超过全区青壮年一百一十三万人的总数。自愿参加业余学习的老年人已有八万余人，比未推行汉语拼音之前，增加了四倍。现在，我们已经作出全面规划，力争大大提前实现无盲省。同时，组织了若干学制改革试点，进一步为教学革命创造经验。并着手准备大量编印政治、技术、文艺等注普通俗读物，以便及时供应正在迅速展开的全民性的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运动的需要。

以上报告妥否，请指示。

中共山西省委

1960年4月5日

（原载1960年5月11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在农村中繼續扫除文盲和 巩固发展业余教育的通知

1959年5月24日

1958年全国掀起了一个扫除文盲高潮，参加識字学习的約有六千万人，扫除了一大批文盲。同时，各地还大量举办了各种农民业余学校，参加学习的达几千万人。这是1958年我国文化革命中一个了不起的成績。去年10月以后，由于全民炼鋼鐵的运动和秋收、秋翻地、秋种运动中劳动力紧张，很多地方的农民业余学习陷于停頓，有的至今尚未复課，因而目前各地扫盲学员回生、复盲現象相当多。

中共中央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在成人中要认真地扫除文盲，組織各种业余学校，进行政治、文化和技术教育。在劳动人民中間实行普及教育，并且逐步提高教育水平，这是縮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別的一个重大步驟，必須认真進行。”^① 目前估計，全国还有青壯年文盲八千万人左右，扫除文盲还是很重的任务。而且在扫盲之后，还要对这些青壯年实行普及的业余教育，不断提高他們的政治、文化、业务水平，这个任务更是很重的。为了实现上述任务，特作如下規定：

^①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1958年12月)，1958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我國教育工作方針》，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2版，第12—13頁。

(一)必須繼續鼓足干勁，在農村中開展扫除文盲運動，採取各種切實有效的辦法，利用一切有利時機，組織尚未擺脫文盲狀態的農民參加識字學習，形成群眾的學習高潮。其中應特別抓緊青年、壯年和基層幹部的扫盲工作。

在全國普通話地區，可以試行用拉丁化拼音字母給漢字注音的辦法幫助扫盲。但這種辦法必須首先經過典型試驗取得經驗，然后再逐步推廣，不要馬上普遍地進行。在非普通話地區，不要採取這個辦法。

要對擺脫文盲狀態的青壯年，逐步實行普及業余初等教育。因此，必須鞏固發展各種業余學校，組織已經擺脫文盲狀態的青壯年繼續學習，使扫盲成績得到鞏固和提高，然后再逐步普及業余中等教育。

(二)必須採取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進行扫盲工作和发展業余教育，大搞群眾運動，把各方面的力量都充分動員起來。在解決師資問題上，堅決採取“以民教民”“能者為師”的辦法。同時採取各種切實有效的措施，幫助群眾教師進修，做到邊教邊學邊提高。

(三)農村中的扫盲工作和農民業余教育的開展，必須和農村生產以及中心工作密切地結合起來。要善于利用適當時機，開展扫盲運動。要善于安排時間，農閑時多學，農忙時少學，太忙時不學。既不過多占用勞動力，又能把扫盲工作和業余教育办好，做到生產學習兩不誤。在組織方面，應當尽可能把學習組織和生產組織統一起來，以便于統一安排生产和學習。農民業余教育要注意貫徹政治、文化、技術相結合的原則，農民業余學校要教政治和文化，還要教生產技術知識，使教育直接地或間接地為生產建設服務。

(四)各級黨委和各級政府教育行政部門，應當積極地組織力量，根據黨的教育工作方針，編寫扫盲和農民業余學校的教材，在

一个省、市、自治区的范围内，除由省、市、自治区编写业余学校的通用教材外，专区、县和有条件的人民公社应当结合当地情况编写补充教材。目前应当抓紧编写或修订文化课通用教材。

(五)完成上述任务的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各级党委，特别是公社党委，在抓思想、抓生产、抓生活的同时，还必须抓学习，对农民群众的生产和学习作统一合理的安排。应当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保证农村社员每天有2小时的学习时间。应当在人民公社整社的过程中把农村中的扫盲运动和群众业余学习认真地开展起来。

(原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1959年第13号，第263—264页)